



福地·乐土

农历十二月初八是传统的腊八节，在内地尤其是山东习俗，在腊八节家家户户吃腊八粥以示庆祝。过了腊八节即是春节快来临了，岁晚气氛渐浓了。屈指一算，腊八节已过，思旋也凑了热闹在家品味了腊八粥。你有否试试吃腊八粥呢？

狗年岁晚，人民币汇价节节上升，对于内地同胞而言是好事，趁早来港办年货，就算是一日游，也满载而归，乐也融融。不过也有不幸者，因为工厂订单不足，老板趁机提早收炉。虽然工人一年忙到晚，倒也想提早休息回家过年，只不过眼看环境如斯，忧心忡忡，未知春节过后是否有开工呢？面对世界经济走下坡，人们心中无数，未知是否会失业。

本周股市开市只数天，然而市场波动，大大上落动辄数百点之波幅，实在得人惊。幸而执笔之时，中央三个部委有关领导联合召开记者会，面对当前国际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影响所及，强如中国的数据也不甚乐观。幸而治国利民的领导人即时实行适用的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以缓解市场的困难和解决市场的需要。

周二上午，财政部、发改委、人民银行三个部委之领导人公开表示，国家会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及

稳定的货币政策，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举措例如减税、降费、降准等，国家对市场调控的准确和一切以人民利益为先的惠民政策，实在令投资者放心，增强了应付环境的信心和勇气。果然，周二扭转了颓废的市场，由A股带动了整个市场的气氛，变为审慎乐观。香港当然亦亦步亦趋，不甘落后，单日股市升幅已有500点之多。正如世界投资者的看法一样，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盛衰着实影响了全世界。

香港股市与楼市是香港经济两大重要支柱。股市有转势之风，楼市亦不甘落后。实际上，香港的发展商是相当有处事的方法，面对楼市步入调整下行之势，年尾发展商已开始扭扭六壬提出种种销售策略，例如大幅降价，例如优惠融资贷款等等，果然撩起了市场潜在的刚性买家，特别是80后、90后的年轻人，在父母的呵护下入市上车。最热闹的是旧区重建项目，人纸者更是争崩头的热闹。其实，市场是由气氛带动，亦是由信心所带动，如此一来，市场买家渐渐浮现，包括二手楼市在内。问题是卖家是否愿意割价出售？

思旋常道，香港实在是福地，香港处处是乐土。只要您心中所见，所想是福地，这就是福地了。



一格惊心的菲林

由中环必列喏士街旧街市活化而成的“香港新闻博物馆”，为香港新闻工作者的朝圣地，这天，跟随“香港资深传媒人联谊会”前往参观，正如该会理事长杨祖坤所说的，“我们有回家的感觉”！

对于耄耋之年的资深传媒人，“回家”的路并不好走，在上环荷李活道文武庙，还要走一段长长的阶梯，才能到达必列喏士街，新闻老人抱着大半个世纪的历史，怀着对“家”的渴望，拾级有劲行山杖，银丝飘飘赤子心。

“香港新闻博物馆”全面展示了香港开埠以来各种媒体的发展过程，香港新闻百年变迁，翻开一页页新闻报道，正正就是一部香港史；一部接收警方频道的电台、一份列有“线人费”银码的采访支票预算，都勾动不同时期新闻工作者曾经炽热的心。

上世纪香港大新闻，1972年的6·18雨灾是其中之一，因为连续大雨，山体滑坡，秀茂坪鸡寮安置区被淹埋，港岛半山旭和大厦坍塌，造成香港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雨灾。今次参观博物馆的资深传媒人当中，就有一位第一时间采访旭和大厦坍塌的师兄，他重温这一段历史，半世纪回眸，这一格菲林也是惊心动魄的。

1972年6·18，这一天气氛特别紧张，中午秀茂坪鸡寮安置区被山泥淹埋，死伤无数，主力记者都奔赴秀茂坪灾场了；人行不久的师兄，刚从新界采访回报社写稿，傍晚接到港岛半山旭和大厦坍塌的线报，因为整个采访部都掏空了，主管只好派出留在报社的“新丁”顶档。

这位师兄勇不可当，临时披了一件黑色胶雨衣，穿着凉鞋，当时没有万次闪光灯，拿起仅余的三粒闪光灯，就奔赴灾场了。

由罗便臣道到旭和道到处是泥泞，现场一片混乱，他混在增援的消防员中，各路救援人员分不清是谁。师兄就站在旭和大厦断墙位置，拍下消防员游绳穿入塌楼里救人的照片，当时被挖掘救出的生还者，重见天日，欣喜若狂，顾不上裸着的身躯，见人就扑，见人就挽，被救者与救人者混作一团。

师兄就是全港唯一当晚在现场见证灾难的传媒人。



忽略的历史成为教育资源

几个月以前我出版了一本有关新界原居民历史的书，在我花了十年的功夫爬梳调研，发现香港社会忽略了新界；忽略了新界的地理位置，忽略了新界历史，忽略了他们承传的文化习俗，忽略了他们的传统教育，甚至忽略了他们对整个香港社会的贡献和牺牲。

新界之所以成为新界，它是租借给英国99年，与港九是割让地有别，我们看1898年6月9日，清廷和英国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原本是广东省宝安县的三分之二土地，划出来作为英国的租界地。在整个大香港1,100多平方公里，新界占了92%土地，由此可见，新界对香港来说是多么的重要。新界有大量的岁月沉淀的历史文化，古物古迹，传统习俗，生活方式等等，可以说是香港的宝藏之地；但是被长期忽略了。

今日正值香港全面重视中国历史教育，即使是通识教育课程也强调了香港历史文化的重要。自1997年迄今，香港已回归22年了，注重中国历史教育的这项政策虽然晚了一点，但总比还没有开始为好！

作为一国之民，必须了解其国家的历史，从而产生对国家的认同感、归属感、自豪感！让香港人了解中国历史，使香港人对中国产生归属感，这在港英殖民时期是空白的，而回归后的中国教育仍然是被忽略的；22年后的今天，身为历史学者、历史老师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感觉良好——社会终于意识到历史教育的重要！

由香港树仁大学历史系与杜叶锡恩教育基金主办的“两岸四地中国历史教育学术研讨会”于上星期在香港历史博物馆举行。约有100多人出席，当中不乏中学的历史老师与学生，有云“不知史，绝其志，不读史，无以言”，历史不仅能鉴古知今，也能让我们更加了解中华民族上下5000年如何博大精深。

教育可分为三个层面，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而对新界原居民来说，还多了民族教育，包括祠堂教育、族谱教育，当一个人做了为非作歹的事情，在祠堂受审，甚至被逐出祠堂；或者当一个人做了光宗耀祖的事情，受到族人的赞许和尊敬，这种种结果自然使得一个人内心自有一条绳索，产生自我约束力！

长久以来较少人关注新界乡村教育，导致村村校愈来愈少，到目前为止，仅余20间；大部分的村校是私塾转型而来，土地大都是祠堂、乡绅捐出。校舍多接近蓝天绿地大自然，全校师生感情融洽，像一个大家庭。笔者提议，每学期市区学生可与村校学生交换学习，也可到新界原居民的练武堂习武，强身健体，融合传统与现代教学，未尝不是教育界一件美事。



■喜见香港各界重视中国历史教育，历史教育对国民来说至关重要，影响深远。作者提供



火锅不是“一道菜”

天气有点冷，很多家庭就掀起火锅热了，拍掌拍得最响的还是小朋友，其次笑着说好的是老人家，总之是老少咸宜的饮食好节目，主妇无所谓，天天都上菜市场，一样照做工夫而已，但是家人开心，自己也特别开心。

吃火锅讲情调，还是最宜在自己家里吃，可是在家吃火锅，看似简单也不简单，对老妈妈们来说，几乎等同是个临时大节日，至少买肉要多几种，菜也多洗三几斤，万物俱备之后，怕吃不完，首先便想到已出嫁的女儿，嘱咐她记得带同老公儿女来吃，蜜运中的儿子奉过母命对女朋友说：“妈叫我们今晚吃火锅呀！”一个“呀”字，女朋友收到温馨讯息，知道未来翁姑对自己已有了好印象，必然喜上眉尖，甜入心窝。不必说，女儿两公婆到时必喜滋滋买篮生果上门了。

肉呀菜呀，为了适应各人不同口味应有尽有摆满一桌子，一家人老少总动员大合作，开枱拉椅大忙小忙都自动帮一把，口味各适其适，爷爷奶奶有他们的心水豆腐鱼滑，大B爱咬骨头细B喜欢大虾，软软硬硬食材齐

备，暖洋洋，热呼呼，大热水滚冒出暖暖的烟雾好看烟花，看似营造却是出于自然那股气氛，百分之一传统中国大家庭风情，平日热开水都不喝，惯以沙律冷盘为主食的洋人又怎能想像火锅的乐趣和味道。

火锅也不是“一道菜”，而是“一锅菜”，是促进亲人知己感情交流的“大和菜”，也是游子归家最先渴望吃到的暖心菜，移民多年的幼弟，每次回港探亲，就总是不忘吃火锅，火锅有那么好吃嘛？他怀念的是一家人团聚的柔和气氛吧。

火锅亦如盆菜，只宜共享，不宜独食。哪些人不喜欢吃火锅？当然是无家室之累，无牵无挂，单身逍遥外地为乐的浪子，怎犯得着独自做大堆工夫吃一顿，食肆里一人火锅食客，似乎自得其乐，外人眼中看来便带有几分寂寞感。



■火锅美在平淡中见风味。作者提供



苏轼在岭南为民造福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领导干部要“心系群众，为民造福”。这样的要求是严格的。我国古代有些官员在这方面也有出色表现，苏轼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苏轼是宋代著名的文坛巨匠，同时又是一位正直、亲民的政府官员。他不但在任时“心则在民”，关心百姓；即使削职遭贬，仍千方百计为民造福，并留下许多不凡业绩……

北宋绍圣元年（1094）四月，苏轼因针砭腐败的朝政得罪了权臣，被流放到“瘴疠之地”岭南，在落后的“蛮貊之邦”惠州充任建昌军司马——一个没有实权的八品芝麻官。在那里，尽管处境艰难，但他“位卑未敢忘忧民”，利用自己的声望和与一些官员的良好关系，做了许多为民兴利除弊的好事。

有一年，当地粮食丰收，谷价下跌，官府征却要现款不要谷子。农民只能按低价卖出谷子，而官府却按高价收税。这样，农民缴的税就成倍增长，这一沉重负担让他们苦不堪言。苏轼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给上级官员写信，揭发当地官员勒索农民的积弊，建议依谷物市价向农民征税。他的建议得到高层的重视，迫使当地官员改变其错误做法。

苏轼不但敢揭积弊，更注重干实事，尤其关心惠州城的改善革新事宜。为了解决百姓出行难问题，他到惠州不久，便跟当地官员会商、谋划，并亲自捐款，在湖上和河上建起两座大桥，大大方便了当地的交通。与此同时，他又做了另外一件颇受地方居民敬仰的好事，即把江边郊野一些无人掩埋的骸骨集中起来，重建一座大冢埋葬，并写了祭文，安慰那些无名死者。这一善举，在当时深得民心。

苏轼关心百姓疾苦，还经常从具体的小事抓起。当他看到当地农民插秧累得腰酸腿痛、每天在水中辛苦劳作时，便积极推广一种比较先进的农业机械——“浮马”。这种浮马就像在水面上漂浮的小船，农民可以坐在上面插

秧，这样既可提高工作效率，又能节省劳力，深受农民欢迎。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苏轼不但关心被贬地惠州的民生，还关心惠州邻近的广州百姓的疾苦。当他得知广州瘟疫流行时，心急如焚，立即给他的好友、时任广州太守的王敏仲写信，为治瘟疫献计献策。在信中，他首先肯定了王太守在防治瘟疫方面所采取的一些有力措施，如设立渡津、抢救孤儿寡妇、准备治疗药物等，这是当时广州最大的政事。

接着又说，广州是商旅聚集的大商港，瘟疫流行，商人旅客先病倒了，接着就会传染给广州市民，这在杭州已有先例。因此，当务之急是在广州设立一所医院，专门收治染上瘟疫的患者。医院所需资金，必须每年有固定的租税之利供给，这样才能维持下去。他进一步强调说，这是件有长远利益的大事，一定要办好它。他还对王太守说的“救助瘟疫患者，是当官的最痛快的事”这句话大加赞扬，并建议他向办事能力卓越的循州周太守学习，还抄给他治疗瘟疫的方药：“用姜、葱、豉三物，浓煮热呷，无不效者”，让他在广州百姓中大力推广。

为了进一步消除瘟疫，苏轼又积极建议解决广州百姓的饮水问题。在苏轼看来，广州人之所以患瘟疫，与饮用水的质量有很大关系。因为广州普通百姓平时喝的都是不洁的苦咸水，所以患病者很多，损失很大，因此他在写给王敏仲的信中，建议他采纳罗浮山道士邓守安的意见，在广州修建清洁水引水工程。邓道士的方案是这样的：在高广州20里的地方有座蒲涧山，山上有滴水岩，那里的山水水位较高，可引入城中。具体方法是先在滴水岩下挖一大石槽蓄水，再将石槽中的水用五根大竹管引出，竹管连接处缠以麻绳，涂上油漆，由高到低地引入城中。

在城中再置一大石槽接受山上引来的清水，然后再用五根竹管分流到城中的许多小石

槽内，供城内居民汲取。这样只需大竹竿万余根，再用些茅草苫盖一下，费用不过数百千钱。为解决这笔资金，可在循州买一部分良田，当年可得租金五七千钱。再买上万根大筋竹，扎成竹筏运到广州，以备水管抽换之用；在广州城中置少量房产，可以日得二百钱租金，以做水管的抽换之费。

另外，再专设兵匠数人，定时沿线巡查维修，做好水管的保护工作。这样一来，广州城的穷人、富人都可以饮上甘冽、清洁的山泉水，真是一件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好事。长期以来饱受苦咸水之苦的广州百姓听说此事，不知会有多高兴，他们一定会热心捐款，其热情会比建造宝塔庙宇更高。为了把这件事办好，苏轼还积极向王太守推荐罗浮山道士邓守安，说他德行高尚，清正廉洁，不贪不占，热心公益，很受人们尊敬，用起来很放心，是负责这项工程的最合适人选，建议去请他来具体商谈。

在苏轼的积极建议下，王太守不负众望，立即组织人力，动工兴建引水工程。苏轼听说后非常高兴，又写信给他，建议施工时在每一根竹管上钻个小孔，用竹钉封上。这样当竹管发生堵塞时，就容易查出堵塞的部位，便于及时疏通。王太守虚心采纳了这些好建议，引水工程顺利建成，解决了广州全城百姓的饮水问题。

苏轼这些建议，无疑是广州人的福音，值得世代铭记。然而他却在信中反复交代，千万不要说出是他的主意。这个中原因，固然与他谦虚的美德有关，他不愿宣扬自己。但更重要的是，他深知自己当时是一个“犯官”，深受当权者的猜忌、迫害。如果把自己公开出来，很可能会使这项工程流产，给朋友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由此可以看出，苏轼在为民造福方面，真是鞠躬尽瘁，呕心沥血，全然不计个人得失。他的博大的爱民情怀，足可彪炳青史，光耀千秋！



有心做事

综援（全称“综合社会保障援助”）前身为早于一九七一年设立的“公共援助计划”，具有救济金和福利金的性质，为社会上没有能力自给自足的市民提供简单的生活资助。这是一项“德政”，也是公民社会必不可少的一环——今日香港的社会福利虽然比以前多，但跟许多发达国家或地区相比，“综援金”仍然少得可怜，基层长者“晚景堪怜”绝非夸张之言。

然而近年，“综援”这个词却予人负面感觉，尤其是社会政治化和楼价高企下，领取综援者仿佛不容于社会。这也反映港人的矛盾：一方面认为在富裕的国际大都会，属于社会最底层的人应得到资助，另一方面又因为出现市民滥用或骗取综援个案，而歧视领取综援者。这其实是市民生活负担愈重的情绪发泄。

只是，基于谁都有老去的一天，舆情仍普遍接受“长者综援”。所以，当政府宣布下月开始将领取“长者综援”的年龄由六十岁提高到六十五岁时，社会反弹颇大，尤其是由市民选出的代议士。这不应该只归咎于“政客煽情”或“民粹作祟”。

随着人的寿命延长，人生七十不再是“古来稀”，“八、九十后”更

大有人在，说“六十岁是中年”也为近年来的“国际共识”，很多国家早把法定退休年龄由以往的六十延长至六十五岁。所以，政府因为退休年龄往后推而调整福利政策，可说“与时俱进”。

然而，虽然政府早在四年前已建议将文职系公务员退休年龄延长至六十五岁，但在商界，并没有多少公司响应，大多数都以六十岁为退休年龄，尤其在“给机会年轻人”这声音日隆的今日，连四、五十岁都被急于上位者指为“阻住地球转”了。所以，在社会尚未有共识下，政府提高领取“长者综援”年龄，尤其特首那句“自己年过六十仍每日工作十多小时”的话令人反感，也自然不过了。

我不相信特首是“凉薄”之人，也并非仅为节省那笔钱，作为行政高官，落实并执行已获立法会批准后的政策，是负责任的体现。只是官员忘了，那些领取综援的人大多数都是需要干体力活或非技术性工作的“蓝领”。不是他们不想工作，而是绝大多数老板不会聘请他们。

问题只是反映管治思维和制度僵化，以及官员对社会的深层次矛盾认识不足。官员有心做事，但“心”要让入看得到，也要紧贴社会脉搏和氛围。



走心与走肾

打针是世上最令我害怕的事情之一。

小的时候听大人吓小孩多是两样事，一是说“不听话就让警察叔叔把你抓走”，二是“不许哭，再哭就让医生给你打针了”。因此形成了条件反射，怕警察，怕医生。当然，作为一个听话的小朋友，坏事是不做的，因此更怕的是被医生抓去打针，怕打针更多的是因为怕疼。小时候的印象是，打的针大多更多是青霉素、庆大霉素之类的针剂，且不说针还没打之前满心的恐惧感，就是每一次打完针之后屁股的疼痛都累积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从幼儿园到小学，学校每年都要给学生打预防针，轮到我们班，每次都是我最后一个打，实在是躲不过去了，才眼泪汪汪地在全班的注目礼之中像上刑场赴死一般地把胳膊伸给医生。

记忆中，父亲在我小的时候唯一一次动手打我亦是因为打针。不记得那次是因为什么原因生病住进了医院，安顿好了之后，医生照例要给我打针，

在我又哭又闹地不顾自己发着高烧坚决拒绝打针之后，四个医生把彼时尚且年幼的我摁在病床上，强硬地把针扎向我的小屁股。结果令人难以想像，由于我的恐惧和紧张，导致全身肌肉绷得太紧，一针下去，针头竟然硬生生地扎断了。针未打成，高烧更甚，父亲正好下班赶到医院，得知此事，二话不说就大力扇了我一个耳光，耳光扇完，我的半边脸马上肿得连眼睛都睁不开了，屁股上的肌肉倒是因此松弛下来，医生这下子便很顺利地完成了打针的任务。

前不久去参加一个活动，听一位做健康食品的女子说她因为从小怕打针，所以去卖健康食品，别人不明白二者之间有何联系，我却是十分理解，吃了健康食品，身体健康了，自然就不用看医生打针了。因此，在我成年以后，我亦是努力地让自己变得健康，因为由此便可以远离医生和打针。

然而生病却总是很难避免的。前几日外出受了风寒，身体极不舒服，我不想去医院，便鼓起勇气到出

身中医世家的闺蜜处请她给我针灸。闺蜜是个极温婉、细致的女子，一面扎针，一面听她轻声细语，对“针”的恐惧便少了一大半。见闺蜜对人体穴位熟悉无比，我更是忽略了扎针的恐惧，玩皮地地问她有无什么穴位针灸之后可以使人变得聪明，写起文章来不必辛苦地苦思冥想。本是玩笑，想不到闺蜜竟然告知真有其事，说是“肝开窍于目，肾开窍于耳”，肝、肾的经络都要通了，人便会耳聪目明，记忆力增强，肾气足了，胆子亦会大一点。我便失笑：难怪我自幼胆小，大抵就是肾气不足的缘故。

中医的神奇自不必言，因此又想起近些年流行的网络热词“走心”和“走肾”。有部爱情电影里，惯于游戏人生的男主角称自己对女生的感情从来都是“走肾”，直到遇上他倾意的女主，才一见钟情地开始“走心”，从逢场作戏的“走肾”到“走心”的真爱，这位男主角大抵是肝肾的经络都通了，变得聪明起来了，因而懂得了“爱”的真谛。